

# “文学文化”与“新人”的塑造

——从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说起

杨 晶

**摘 要:** 鲍勃·迪伦及其作品,是“文学文化”的典范,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可谓实至名归;与一般的流行音乐不同,鲍勃·迪伦的作品属于“想象力文化”,是“新感受力”的核心所在;它赓续了一个深刻的理想主义传统,是一种思想动荡的载体。鲍勃·迪伦的作品自觉介入、参与社会议题,思考、诠释时代性问题,创造出了滋养人们隐秘生活、维护自由空间、实现公平正义的诗意的“文学文化”;它通过移情、想象达成与扩大了“团结”,塑造出了“新人”,即“善于成为人的人”,有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进步。对于“文学文化”的创构,鲍勃·迪伦获诺奖这一事件启示良多。

**关键词:** 鲍勃·迪伦; 新感受力; 理查德·罗蒂; 文学文化; 新人

**作者简介:** 杨晶,文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青少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青年文化、旅游文化与传媒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街9号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青少所,邮政编码:100102。电子邮箱:yjlinglan@163.com

**Title:** Strength of Voice: The Making of “Literary Culture” and the “New Individual”

**Abstract:** Bob Dylan and his rock and roll works are examples of “literary culture”, and he is worthy of the 2016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popular music, Dylan’s works belong to “imaginative culture”, are a continuation of a profound idealistic tradition and carrier of ideological unrest. His works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social issues, and contemplate and interpret common concerns of the times, thus creating a poetic “literary culture” that nourish private life, safeguard free space, and realizes fairness and justice. Through empathy and imagination, they realize and enlarge “solidarity” and therefore create “new individuals”, or individuals who are good at becoming humans. All this promotes modern social progress.

**Keywords:** Bob Dylan; new sensibility; Richard Rorty; literary culture; “new individual”

**Author:** Yang Jing, Ph. D.,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in Institute of youth at Beijing Youth political College.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literary theory, globaliz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tourism and media. Email: yjlinglan@163.com

2016 年 10 月 13 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 75 岁的美国民谣摇滚歌手、诗人鲍勃·迪伦。对此,人们一片惊呼,或愤怒或痛心或不解。鲍勃·迪伦的获奖预示着“文学文化”建构的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6 年 12 月 10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2016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诺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Horace Engdahl)在授奖词中介绍了鲍勃·迪伦的成就,指出鲍勃·迪伦数十年来全身心地投入于美国流行音乐中,所创作的歌曲

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鲍勃·迪伦的歌曲之美是最高的美,他通过抓住并改变“一个简单的、被忽略的艺术形式”,给世界文学带来了“伟大的转变”;鲍勃·迪伦的毕生作品“改变了我们关于诗歌可以是什么,以及诗歌可以如何作用的观点”(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词里霍拉斯·恩格道尔还指出,迪伦“获得文学奖是因为颠覆了文学系统吗?并不是。还有个更简单的解释,这个解释所有看过迪伦演出的观众都懂,他们都怀着一颗跳动的心,站在迪伦那永不停歇的巡演舞台前,等待着那魔力般的声音响起。鲍勃·迪伦的作品‘改变了我们关于诗歌可以是什么,以及诗歌可以如何作用的观点’”(诺贝尔文学奖)。

鲍勃·迪伦的确是一个歌手,一个摇滚乐歌手,并由于对摇滚音乐的突出贡献被称为“摇滚教父”。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鲍勃·迪伦?为什么是摇滚乐化的民谣而不是其它流行音乐?

在消费社会里,“文化产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学越来越趋向于自我指涉,趋向于能指的自主性——写作即有关词语而非现实事物的活动。结果,文学完全失掉了把握“可普遍化的经验”的能力,作家面对现实时表现出严重的无能为力。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1933年—2004年)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该如何去追求那种“可普遍化的经验”,而是我们该如何追求拥有经验的能力;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注重的是对那种经验的内容的把握,后者关注的是能够经验的能力。在她看来,只要我们具有那样的感受力,我们就会真正拥有相应的经验。苏珊·桑塔格说:“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17);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艺术实际上是那些内容要少得多、道德评判方式要冷静得多的艺术——如音乐、电影、舞蹈、建筑、绘画和雕刻。这些艺术的实践——它们全都大量地、自自然然地、不觉尴尬地吸纳科学和技术的因素——是新感受力的核心所在”(346)。

声音,是外部世界贯穿我们生命时间的唯一元素;它永不休止,无所不在。与其他艺术相比,音乐能更为直接、强烈地侵袭和完全占领人们的感官,将我们引向某一精神层面,在更高阶段攫取知识或“觉醒”。苏珊·桑塔格称在艺术作品中,音乐是一个重要的例外。的确,倾听具有跨越国

界、跨越文化的共通性,这是语言所不具有的——一种语言的词汇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确切对等的词汇。因此,在中西神话中,声音尤其是音乐声与人声,都被赋予了许多特别的能力:首先,声音被赋予催生的能力。宗教与神话经常将人声当成促使涌现、开创、树立和孕育的力量,从而将音乐声当成创造性的力量。其次,神话中的人声还会向我们展示吸引和迷失的力量,其中的音乐会吸引、诱惑、追溯时间,使其永恒化、凝固化;声音还可以起到符号、征兆的作用,为时间加上印记,强调我们所持的某种观念,遭遇某个事件等等。再次,声音是协调一致、力量间取得平衡的象征。当音乐将我们引向某一精神层面时,它牵涉的一定是音乐中运动与形式的和谐。声音作为启动者,与在一种能量循环下无休止运动的思想取得联系。用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话说:“响起,永远响起,照亮我们的思想”(希翁 177—89)。

摇滚是一种不纯的音乐形式,迄今没有一个为多数评论家所能接受的定义。迥异于一般的流行音乐,摇滚有一种所谓的态度、价值或是精神。我们知道,“摇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节奏与布鲁斯”(rhythm and blues),这种体裁在1950年前后出现于美国南部。鼓、电吉他、电贝司、萨克斯、连喊带唱的唱词等因素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粗犷的、有驱动力的、非常适合于舞蹈的音乐体验。“节奏与布鲁斯”成为叛逆的美国青年的音乐,这种功能在它发展成“摇滚乐”时得到了增长。“摇滚乐”这个术语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流行歌曲里就出现了,而它的起源还更为古老。“摇”和“滚”本来是描述船的运动的航海术语,后来在美国黑人的圈子里,它不仅被用来描述在宗教的狂喜状态中身体的抽搐,而且也用来描述舞蹈的动作,带有明显的性的暗示。在50年代初,这一说法被白人电台唱片骑士(DJ)的先驱阿伦·弗里德(Alan Freed)赋予了新的生命,他更喜欢用“摇滚乐”而不愿意用“节奏与布鲁斯”。因此,“摇滚乐”的成熟风格是一种黑人的“节奏与布鲁斯”和广泛的来自城乡的黑人和白人的影响的混合物(莱特 442—44)。从诞生之初,“摇滚乐”就带着叛逆的胎记,在挑动年轻人欲望的同时,葆有一个深刻的理想主义传统,时刻质问保守的社会体制。可以说,摇滚乐是一种思想动荡的载体。

聆听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琼·贝兹、冲击乐团、U2、“电台司令”……这些伟大的摇滚乐手创造了一种有攻势的音响织体,迸发出面对社会种种不公时的呐喊与愤怒,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介入社会、抵抗现实、反叛主流体制、寻求个体自由的力量。他们抓住了时代的想象力,发出了时代的声响。当他们的歌曲在抗争现场被吟唱时,营造出一个“自我”与“他者”对视、交流、同生共在的“诗化”空间,促成了“自我”与“他者”的交流与融通,凝聚了参与群众的力量,成为飘扬在空中的反抗旗帜;它们鼓舞人心,并分享着集体的愿景,形成集体的情感以及共同的社会实践蓝图。

大半个世纪以来,鲍勃·迪伦高举疏离、抗议与精神探索的旗帜,不断地扩大“摇滚”反抗的范围,准确反映了现代文化中那令人不安的超现实的部分,改变了艺术家和观众对于自己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如,鲍勃·迪伦的名作《像一块滚石》(1965年),它所叙说的是关于失败者的命运、自我放逐的无奈,以及旁观者的清醒、独立;它集中了一代社会的弃儿对社会的怀疑,以及对不公正体制的否定,具有悲怆、尖锐的现实意义。“感觉如何/感觉如何/孤苦伶仃/没有回家的路/像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像一块滚石?”这段歌词反复咏叹,反复诘问,其大气、悲悯吸引着现场成千上万的人举着打火机同声而唱。这是一代人的圣歌!他的全部36张传奇专辑,就是这样勇敢而有洞察力地展示了无以伦比的创造力,一次又一次地把美国丰富的历史、声音和荒诞故事抽离出来,描绘得新鲜而刺激,从而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文化(英国 UNCUT 编辑部)。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可谓实至名归。

## 二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诺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说,他们有意于拓宽对文学的定义。从历史上看,诺贝尔文学奖也曾授予过非文学家,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著名政治家邱吉尔和德国著名的古罗马史专家蒙森等人,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

我们今日所谓的“文学”观念(特指那些富有艺术创造性、想象性(包括虚构性)、审美性的作品类型)大概不过200年左右的历史(威德森

36)。1959年,C. P. 斯诺提出了“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区分,在大西洋两岸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斯诺认为,文学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家分别代表了两种难以沟通的文化。斯诺演讲的主题仍是19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展开的科学与文化之争,他的立场比赫胥黎更为激进。在两种文化之间,他并不恪守中立,而是站在科学家的立场批评人文知识分子,认为人文知识分子陷入了道德上的泥淖:满足于个人的悲剧,坐视同胞食不果腹、死非其时;他们沉溺于传统文化,反对技术进步。在科学家身上,我们则看到一种百折不挠、决心与同伴奋斗到底的精神,物理世界科学大厦是人类心智最伟大的创造;科学家的声音洪亮自信,他们骨子里有着未来(斯诺10)。

1965年,苏珊·桑塔格质疑了C. P. 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论说,指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一个幻觉,是发生深刻的、令人困惑的历史变化的时代产生的一个暂时现象。我们所目睹的,与其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冲突,不如说是某种新的(具有潜在一致性的)感受力的创造。这种新感受力必然根植于我们的体验,在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那些体验——对极端的社会流动性和身体流动性的体验,对人类所处环境的拥挤不堪(人口和物品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激增)的体验,对所能获得的诸如速度(身体的速度,如乘飞机旅行的情形;画面的速度,如电影中的情形)一类的新感觉的体验,对那种因艺术品的大规模再生产而成为可能的艺术的泛文化观点的体验”(桑塔格343)。

理查德·罗蒂则继承并发展了C. P. 斯诺“两种文化”的观点和方法,并进一步扩大了文学所涵盖的范围,将哲学与科学也囊括其中,宣称:“文学现在已经取代了宗教、科学和哲学而成为我们文化的统辖学科,[……]一个篡权的学科去统辖文化其他部分的宣称只能通过展示它使其他学科各归其位的能力来辩护。这正是文学文化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功”(Rorty, *Consequences* 86)。

在理查德·罗蒂看来,“文学的语言依赖着(而且未来还会继续依赖着)日常的语言,尤其是日常的道德语言。文学的兴趣将会永远依赖着道德的兴趣”(《偶然、反讽与团结》229);此外,“文学批评”同样促进了社会的道德进步与团结:“现

在文学批评家不再从事所谓‘文学性质’的发觉和阐述,而应该建议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建议如何缓和这传统中的张力,或如有必要,加剧这些张力——来促进人们的道德反省”(117)。显然,理查德·罗蒂所持的是“大文学观”,他说:“‘文学’一词现在所涵盖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只要一本书有可能具备道德相关性——有可能转变一个人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学的书”(117)。理查德·罗蒂所谓的“文学批评”也已延伸扩大到“神学、哲学、社会理论、改革派的政治纲领,以及革命宣言。简言之,即扩大到凡是可能为人提供可选择的终极语汇的一切书籍”(116),而“逐渐地、半自觉地取得过去曾经(先后)被宗教、科学和哲学所占有的文化角色”,其在民主社会的高级文化中的地位愈来愈显著(117)。

在理查德·罗蒂所谓的“文学文化”中,“既不是在与非人类的位格的非认知的关系中,也不是在与命题的认知关系中找到救赎,而是在与其他人的非认知关系中,藉由人类作品诸如书籍、建筑、绘画和歌曲等建立的关系中找到。这些作品能使人浏览其他方式的人生”(《哲学、文学和政治》105)。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在我们以前崇拜光芒四射的逻各斯的地方,为文学这个以文学语言表达其声音的灰暗的上帝设置一个祭坛。实用主义者乐于见到的不是高高的祭坛,而是许多画展、书展、电影、音乐会、人种博物馆、科技博物馆,等等。总之,是许多文化的选择,而不是某个有特权的核心学科或制度”(《后哲学文化》154)。

理查德·罗蒂指出,作为“文学文化”的创造者,“文学知识分子”是“追求布鲁姆式自律、且幸运地有足够的金钱和空闲为此做些事情的人”;他们阅读许多书籍而意识到存在着多样可能的生活目的、存在着多种可能的再描述而不是一种再描述,并通过文学所展示的人类的多样性来获得救赎,从而成为一个自律的自我(《哲学、文学和政治》102);“他们有使他们的自身形象保持灵活的那种想法和胆量。这并不很容易做到,而且很少有人能做到。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区别,就是那些同时记得使用不同的词汇的人和那些只记得一种‘词汇’的人的区别”(《实用主义哲学》331)。因此,高明的作家和读者都属于“文学知

识分子”,都是“同时记得使用不同的词汇的人”;他们建构一种伦理的审美生活,创造了所谓的公共“团结”(human solidarity)。美国学者斯坦利·罗森说得好:“如果有整体——就是说,有人类经验的统一性,那只能通过诗去接近。相反,如果没有整体,我们必须再次通过诗发明它”(罗森 7)。

毋庸置疑,摇滚乐属于理查德·罗蒂所高扬的“文学文化”,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琼·贝兹、冲击乐团、U2、“电台司令”等都是这种想象力文化的创造者。作为一种随意性极强的活动,摇滚与其说是一种音乐类型,毋宁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包括音乐,包括与它相关的其他形式和行为,还包括演唱者、伴奏者和听众。听众不是来欣赏或仅是听演奏的音乐,而是为了参加到一个事件中去;他们与其中的角色建立起联系,跟着一起唱、叫喊、吹口哨、跺脚、拍手,和歌手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听到。歌词并非其最主要的方面,大部分摇滚乐的歌词都听不懂,跟其他语言一样飘忽不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歌词所起的也许主要是“音乐的”作用。一个乐队或歌手则实际是制作出的“演唱组”,他不仅与具体的唱片有关,还与歌词、服装、胶片、唱片封套、录像、演出风格、音乐会舞台等有关,是各种媒体共同合作的产物。摇滚歌星绝非只是音乐家,或多或少也是演员,在扮演自己创造的不同社会角色时,并不去改变自己或赋予角色以生命;他们一路唱下去,在演绎着自己(沙姆韦 54-77)。鲍勃·迪伦也不例外。

鲍勃·迪伦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稿中,除了表示喜悦和感激之情外,也在思考:“我的歌曲创作是文学吗?”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我始终只是个民谣歌手而已,在歌唱的时间热泪盈眶,歌声在闪光的雾气间浮动”(布里埃)。在笔者看来,鲍勃·迪伦所建构的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文学文化”。

鲍勃·迪伦三十张专辑所展现的他与他的时代犹如脐带一般的牵连,他深知每个人头脑里的真实想法,他使用现在进行时对每个人说话,创作出了许多够分量的、被许多敏感的心共鸣的杰出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是对个人生命中事件的反思探索,另一方面又超越历史和政治的其他维度,将之作为人类处境的样本,进入了普遍的人类意识;其意义是超乎个人层面的,每个音符都在尝试

理解和治愈人类存在的痛苦。

鲍勃·迪伦把对人类社会问题的关注融入到充满激情的诗歌与音乐之中,以其充满现实感的诗性表达感动了无数人,并深刻介入了当下的生活实践。如,创作于1962年4月的《答案在风中飘荡》,是一首左翼的抗议歌曲,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尖锐、痛彻的疑问,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只能在风中飘荡。“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鲍勃·迪伦在这首歌的第一句这样问道,悄然而坚定地代表新一代,要求接管这个世界,毫不妥协地表达了对一切丑陋事物的不满和愤怒。1963年8月,在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游行集会上,这首歌由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唱组合演唱,迅速红遍美国,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圣歌。鲍勃·迪伦就是这样开启了我们脑子里的某处开关,打开了我们的胸腔,让我们为自由而歌、为希望而歌、为和平而歌,让我们的脊椎随之激动颤抖。这是爱的迸发,是精神意识的开端,是社会和谐的发动机,是“此时此地”我们所亟需的“新感受力”。

### 三

从“文学文化”的视域看,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摇滚教父”鲍勃·迪伦,反映了近几十年来文学观念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创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时至今日,从“诗歌”时代到“散文”时代,再到“科技”时代,我们的文化进入了一个变革深刻的时期。在“全媒体”时代,文学作为人文精神最为核心的旗帜性地位似乎正在丧失,仿佛退居到了时代的次要位置。当文学已失去了之前的轰动效应,理查德·罗蒂所高扬的“文学文化”是否还能存续下去?2004年7月6日,理查德·罗蒂在南开大学演讲时,就有听众提出这个质疑。理查德·罗蒂的回答是:即便在过去,高雅文学的接受者也主要是少数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其被接受的程度跟现在差不多,就此而言,不能说文学已穷途末路了(陆扬 王毅 353)。理查德·罗蒂说:“文学文化从不试图逃避时间寻求永恒。这个文化的前提是虽然想象力有目前的界限,但是这些界限都能够被永远拓展下去。想象力无限地消耗自己

的作品。它是永生的,永远扩展自己的火焰。虽然布鲁姆称作的‘陈旧的恐惧’在文学文化中一直存在,这种恐惧本身却使火焰更猛烈”(《哲学、文学和政治》106)。

在理查德·罗蒂看来,想象是“一种创造隐喻的机能”(《偶然、反讽与团结》55);他期望经由想象建构一个自由主义的“诗化”乌托邦,主张放弃形而上学,以想象取代理性,以希望取代知识,实现人类的公共“团结”。也就是说,想象力是促进“文学文化”发展不竭的内在动力。因此,理查德·罗蒂特别强调了“文学”的作用。

约翰·列侬的作品《想象》里有这么几句歌词:“你说我会做梦/但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也加入我们/那时候世界将变得完整。”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流行音乐无疑是集体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之一。“个人表现必定要有一个分享一种共同语汇的群体。如果这个群体由某人或千百万的同时代人组成,那么,基本的语汇就必植根于大众传媒所提供的物质材料之中”(西奥多·格拉西克6)。在历史上,摇滚乐的诞生本身就青年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密不可分,不同的历史时刻,流行音乐把政治激进主义转化成更让人接近的形式,指出社会的不义和压迫,有助于分享集体的愿景。表演者和歌曲成为政治、文化变迁和流行音乐间的纽带。而正是无数人价值的变迁,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基础(张铁志 26)。

理查德·罗蒂指出,在通过想象构建自由主义之“诗化”乌托邦的过程中,必须熟悉他人所拥有的“终极语汇”,才可能实现人类的公共“团结”:“每一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组语词,来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生命提供理据。我们利用这些语词,来表达对朋友的赞美,对敌人的谴责,陈述我们的长期规划、最深层的自我怀疑和最高的期望。我们也利用这些语词,时而前瞻时而回顾地述说我们的人生故事。我称这些语词是一个人的‘终极语汇’(final vocabulary)”(《偶然、反讽与团结》106)。“公民的语言,公共责任的语言,参与国家事务的语言,将不是一种原初的、自我创造的语言。我们看成诗人或制造者的某些人想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因为他们想发明一个新的自我。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极力将那种诗意的努力看成是可综合的,它能同参与公共话语结合起来。我并不认为这两者是可以结合

的;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一方最终不会与另一方进行相互作用”(《哲学的场景》242)。理查德·罗蒂认为,宽容论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将是未来社会的主体,“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到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后哲学文化》5)。因此,他将“对话”当作自己新实用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认为理想的理性就是宽容、尊重和倾听他人的观点,以说服而不是压服达成一致,其目的“在于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尽情地发挥他或她的能力来从事自我创造,而且这个目的所要求的,除了和平和财富之外,还有标准的‘布尔乔亚自由’”(《偶然、反讽与团结》120)。

英国歌手比利·布雷格说得好:“艺术家的角色不是要想出答案,而是要敏锐地提出正确问题,阅听人才是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体”(Collins 195)。社会变迁的关键之一,在于参与者个人认同的转变。鲍勃·迪伦以其摇滚化了的民谣改变世界,正是通过改变个人的信念与价值来实现的。不理解道德现象的科学是粗鄙的,不为正义之情所激发的艺术是琐屑的。现代社会,人们习惯于冷漠,习惯于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表现为世故、油条、无所谓……尽管现实情形如此不堪,但是,“人类精神是不会轻易被打垮的,艺术家、思想家,以及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会奋起反抗,营造出反抗的亚文化,表现出互助互惠的一面和悲剧式的同情心”(努斯鲍姆 315)。

我们知道,实用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它关心人以及人的生活 and 幸福——对人的现实问题的关注是实用主义的重要特征。作为实用主义复兴者之一,理查德·罗蒂将这一特征突出和强化了。他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创造“新人”的思想,其“文学文化”的最终指向亦在于此。理查德·罗蒂坚信:“文学文化”能促使我们“脱离旧我,帮助我们成为新人”,即“善于成为人的人”(《后哲学文化》315)。

如前所述,鲍勃·迪伦的作品是融合了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美学形式与文化创造,其魅力就在于用强大的自我心理迅即介入、参与社会议题,响应、捕捉、思考和诠释时代性问题,掌握其时代性的文化歇斯底里,发出自己应该发出的真实的声音。作为一个民谣摇滚歌手、诗人,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文学文化”

建构所取得的实绩。这一事件是否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启示我们叙写温润的富有生机的生活场景,创建出适应新时代的“新感受力”,滋养我们隐秘生活,维护自由空间,实现公平正义的“文学文化”,进而创造出开放、自由、宽容、幸福的“新人”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Collins, Andrew. *Billy Bragg: Still Suitable for Miners—The Official Biography*. Virgin Publishing, 2002.
- 让-多米尼克·布里埃:“扉页题词”,《鲍勃·迪伦:诗人之歌》,文蕴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
- [Di Brie, Jean Dominic. “Title Page Inscription.” *Bob Dylan: Song of Poets*.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 Ginsbergblog. 18 Jun. 2012. < <http://ginsbergblog.blogspot.de/2012/06/allen-ginsberg-criticizes-bob-dylan-mmp.htm> > .
- 西奥多·格拉西克:“阿多诺、爵士乐、流行音乐的接受”,《摇滚与文化》,王逢振等编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53。
- [Grasik, Theodore. “Adorno, Jazz, Pop Music Acceptance.” *Rock and Culture*. Ed. Wang Fengzhen, et al. . Tianjin: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
- 顾彬:“德国学者的新离骚”。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3月3日,< <http://2011.bfsu.edu.cn/archives/4039> > .
- [Kubin, Wolfgang. “The German Scholar’s New *Li Sao*.” *Chinese Culture Goes out of Synergy Innovation Center*. 3Mar. 2017. < <http://2011.bfsu.edu.cn/archives/4039> > . ]
- 米歇尔·希翁:《声音》,张艾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Hio, Michel. *Sound*. Trans. Zhang Aigo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 陆扬 王毅:《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 [Lu, Yang, and Wang Yi.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玛莎·努斯鲍姆:“同情心的泯灭:奥威尔和美国的政治生活”,《〈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阿博特·格里森、玛莎·努斯鲍姆、杰克·戈德史密斯编,董晓洁、侯玮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320-327。
- [Nussbaum, Martha. “Sympathy: Orwell and Devoid of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1984 and Our Future. Ed.

- Abbott Gleeson, Martha Nussbaum, and Jack Godesmith. Trans. Dong Xiaojie and Hou Weiping. Beijing: Law Press, 2013. 320 - 327]
- Ricks, Christopher. *Dylan's Visions of Sin*. Harper Perennial, 2005.
- Rorty, Richard.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 *Nineteenth - Century Idealism and Twentieth - Century Textualism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Trans. Xu Wenr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 :《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 [---. *Culture of Post - Philosophy*. Trans. Huang Y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 :《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 [---.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Trans. Li Youzhe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 :《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 [---.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rans. Huang Zongy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 :《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 [---. *Philosophy of Pragmatism*. Trans. Lin N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 :《哲学的场景》,王俊、陆月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 [---. *Scenes of Philosophy*. Trans. Wang Junand and Lu Yueh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 斯坦利·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
- [Rosen, Stanley.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Poetry and Philosophy*. Trans. Zhang Hui.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4.]
- 大卫·R.沙姆韦:“摇滚:一种文化活动”,王逢振等编译,《摇滚与文化》。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54-77。
- [Shumway, David R.. “Rock : A Cultural Activity.” *Rock and Culture*. Ed. Wang Fengzhen. Tianjin: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0.]
- 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 [Snow, C. P.. *The Two Cultures*. Trans. Ji Shul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 [Sontag, Susa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Trans. Cheng W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 英国 UNCUT 编辑部编:《经典摇滚音乐指南:鲍勃·迪伦》,宋世超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
- [The British UNCUT Editorial Department. *Classic Rock Music Guide: Bob Dylan*. Trans. Song Shichao.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ress, Inc. 2016.]
- 诺贝尔文学奖:“迪伦领奖讲演和颁奖词”,搜狐文化,2016年12月11日, < [http://mt.sohu.com/d20161211/121248646\\_488738.shtml](http://mt.sohu.com/d20161211/121248646_488738.shtml) > 。
-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Dylan's Award Speech and Award Words.” Sohu Culture. 11Dec. 2016. < [http://mt.sohu.com/d20161211/121248646\\_488738.shtml](http://mt.sohu.com/d20161211/121248646_488738.shtml) > .]
-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Widerson, Peter. *A Brief History of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克雷格·莱特:《聆听音乐》(第五版),余志刚、李秀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 [Wright, Craig. *Listening to Music (Fifth Edition)*. Trans. Yu Zhigang and Li Xiuj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张铁志:《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Zhang, Tiezhi: *Can Rock and Roll Change the World?*.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责任编辑:王嘉军)